

王曉霞 著

網維國本

晚清官書局研究

晚清官書局研究書系

主編 韋力

江西高校出版社

晚清官书局研究书系

主编 韦力

# 網維國本

## 晚清官书局研究

王晓霞 著



江西高校出版社  
JIANGXI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纲维国本 : 晚清官书局研究 / 王晓霞著 . — 南昌 :

江西高校出版社 , 2018.7

( 晚清官书局研究书系 / 韦力主编 )

ISBN 978-7-5493-7320-8

I . ① 纲… II . ① 王… III . ① 出版发行机构 - 研究 - 中国 - 清后期 IV . ① G239.29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 2018 ) 第 139195 号

GANGWEIGUOBEN

WANQING GUANSHUJU YANJIU

出版发行	江西高校出版社
策划人	詹斌 毛静
责任编辑	刘翔 毛静
装帧设计	邓家珏
版式设计	龙创设计工作室
责任印制	董纲 李香娇
社址	江西省南昌市洪都北大道 96 号
总编室电话	( 0791 ) 88504319
销售电话	( 0791 ) 88517295
网址	www.juacp.com
印刷	浙江海虹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00mm × 1000mm 1/16
印张	19
字数	250 千字
版次	2018 年 7 月第 1 版
印次	201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493-7320-8
定价	98.00 元

赣版权登字 -07-2018-659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图书若有印装问题,请随时向本社印制部 ( 0791-88513257 ) 退换

# 序

这本著作是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今年距离博士毕业已经七年，但直到近两年才有勇气重新修改。著作仅保留了博士论文百分之二三十的内容。之所以迟迟未动笔修改，是因为不敢。因当时自身的能力有限，博士论文写得比较粗糙，未能完成预先制订的计划，所以害怕面对，害怕看到懦弱的自己。不知道其他人的博士体验，我的博士生活中时时悬着一柄剑，发表两篇cssci论文，获得博士毕业的基本资格。很多事情，往往只关注结果的时候，尤其是比较困难的结果时，过程必定充满着焦虑不安和无可言说的苦楚。尽管努力调适自己的情绪，积极应对，但仍无法静下心来，做到为学问而学问。浮躁不安之下，不可能写出高质量的文章。因此，通过答辩之后，随即把博士论文“雪藏”了，放在自以为看不见的地方，落个眼前清净。现在想来当时的自己多幼稚啊，博士毕业论文，一辈子唯一一次的“成果”，我竟然能如此对待！真是自欺欺人啊！后来曾无数次地设想过“如果”，如果能更认真对待，如果能完全调整好心态，如果能……但人生没有“如果”，每天都是现场直播，不允许“重来一遍”。幸好，及时“幡然醒悟”，经历过无数次的“扪心自问”，无数次的纠结，下定决心来“修补”博士的缺憾。重新“修正”自己，能够面对自己，在我看来，是一件值得的事情。

最早选择将“官书局”作为研究对象，是注意到作为出版行业史的“官

书局”。学界的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从晚清时期到当代，皆有不少学者关注，如叶德辉、柳诒徵、梅宪华、吴瑞秀、吴家驹、张宗友、孔毅等，在一定程度上推进着官书局的研究。但仔细阅读发现，研究文章多是“就书局论书局”，缺少历史感。由于本科新闻学的背景，对出版史有一种天然的兴趣和热情。这吸引着我去关注和研究这个课题。彼时为了突出研究的方法和视角，引入阅读史和书籍史的研究方法。尽管研读了一些国内外学者的著作，对阅读史和书籍史处于一知半解，但希望能有所突破，抱着侥幸的心态，撰写了“官书局书籍阅读”的章节。现在再次翻阅“不忍卒读”，对书籍史和阅读史的尝试，在我看来，是大胆而失败的。后来才明白，求新求异，并不是史学的本色。扎实的史料分析，才是历史的基本功。

尽管无法面对躁动不安自己，但对于这个课题的研究，一直在关注和继续着。特别感谢学者李志茗关于官书局的研究文章。他的文章，优美的文采，扎实的史实考证，对我触动很大。因此，开始混迹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等，在原有资料的基础上，深挖资料，补充关键史料。在查阅资料的过程中，对官书局的认识有了新的思考。庆幸的是，2015年我申报“晚清官书局再研究”课题，获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青年基金（15YJC770036），这对我的研究来说是莫大的鼓励。这本著作亦是课题的阶段性生活之一。

书名虽然冠以“晚清官书局研究”，但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出版行业史研究，而是试图从社会文化史的角度对官书局进行考察，将官书局视为晚清时期重要的社会和文化现象，透过官书局思考晚清时期政治与文化的互动、出版与政治权威的关系。书中呈现的内容是官书局的整体研究，亦回答了官书局的

诸多细节，如官书局与晚清众多“局所”的关系、官书局的刊刻程序、书局之间的互动、局内人员待遇情况、书局的名称变化、甲午战后官书局的新变化、官书局与编译官书局的关系、官书局的走向、官书局没落的深层次原因等，基本上能够呈现出作为当时社会和文化现象的“官书局”的概貌。

在整体研究之时，也尝试发表系列论文。如对“官书局”概念认知上，至今仍存在着不少争议。拙文《晚清官书局三则问题考略》，发表于《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4年第11期，试图回答“何谓官书局”，但因水平和能力有限，有点“初生牛犊不怕虎”，对“官书局”的认识有一定的偏差，将官书局界定为晚清时期官方创办的地方书局、官方前后期创办的译书局，包括京师同文馆、江南制造总局等。经过充分研究认为，“官书局”应是各省督抚设立的“书局”，是晚清众多“局”的一种，是为解决战后文化资源短缺，重建地方文教，恢复地方文化秩序，作为“对既有行政能力不足的一种临时调整和补充”，被纳入官方意识形态重构的框架之中，是传统“文以载道”思路在新情势下的延续，应包括19世纪60年代各省督抚设立的“书局”以及甲午之后清廷及地方上设立的“官书局”。在此，我对此前的论断进行修正和说明，尽可能避免“以讹传讹”，并为对学界同仁带来的困扰，表示深深的歉意！拙文《晚清地方书局经费来源考》（《历史档案》2014年第4期）、《“纲维国本”：晚清官书局刊刻之经史类书》（《现代出版》2018年第2期）等，聚焦于官书局的细节，试图以小见大，丰富对晚清官书局的进一步认识。

关于本书，仍有几点需要说明。第一，对于当时创办了多少个官书局，书中并没有说明。并不是不想回答，而是学界对官书局数量统计已经相当成熟。学者李志茗、周武、张宗文等在研究论文中都有呈现，他们很明确地回答了官

书局的数量问题，再做显得有些“画蛇添足”。第二，书局的个案研究。这是我目前正在做的内容，但因为资料有限且分散各地，搜集起来有一定难度。目前已经完成的是“京都官书局”，即将见刊。各省书局的研究正在资料搜集和写作中，将以论文形式呈现。第三，“书目”的研究和利用非常有限。关于各省书局的书目，资料相当丰富。但到目前为止，并未能找到合适的研究方法，无法进行书目的有效研究。这是我下一步要进行的研究，同样以论文形式呈现。

当然，这本著作仍有需要推进的地方，存在着一定的不足，希望学界同仁不吝赐教，批评指正！著作的出版，不是研究的“终结”，恰恰是“开始”，开始学习做更好的研究。当真正学会面对自己，学会与自己相处，才能够心平气和地开始。如今，一切刚刚好。

王晓霞

2018年于天津南开园

# 目录

## CONTENTS

- 绪论 / 1
- 第一章 官书局的兴起及发展 / 28
- 第一节 清前期的官方出版活动 / 29
- 第二节 官书局创办的社会背景 / 45
- 第三节 官书局的兴盛 / 63
- 第二章 官书局的组织管理 / 87
- 第一节 书局人员的遴选 / 87
- 第二节 书局的日常活动 / 103
- 第三节 书局的内外交往 / 124
- 第三章 官书局的刊刻活动 / 140
- 第一节 官刻书之内容 / 140
- 第二节 官刻书之刊刻 / 154
- 第三节 官刻书之流通 / 174
- 第四章 晚清官书局的历史命运 / 192
- 第一节 晚清官书局的走向 / 192
- 第二节 晚清官书局没落之原因 / 211
- 第五章 官书局与晚清政治和文化 / 228
- 第一节 官书局与晚清政治 / 228
- 第二节 官书局与晚清文化 / 245
- 结语 / 262
- 参考文献 / 268
- 后记 / 287



# 绪论

## 一、关于“官书局”

对于“官书局”的研究范畴,学界一直存在着不同的观点,大致分为三种。第一种观点主要出现在民国学者著作中,他们将同光时期设立的书局称为“官书局”,如朱士嘉在《官书局书目汇编》中称:“官书局创始于同治,极盛于光绪。”<sup>[1]</sup>这种观点将地方督抚设立的书局以及清廷设立的“官书局”并称为“官书局”。第二种观点认为“官书局”指的是19世纪60至90年代地方督抚设立的众多书局,称为“地方官书局”。第三种观点认为“官书局”的研究对象应包括地方督抚在各省设立的书局和清廷明令设立的“官书局”以及当时的译书局。<sup>[2]</sup>这里的译书局只包括甲午之后清廷设立的编译书局,并不包括19世纪60年代设立的同文馆、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等机构。到底哪种观点能够准确地表达“官书局”的内涵?这需要进一步考察“局”、“书局”、“官书局”。

据学者考察,“局”最早出现在北齐<sup>[3]</sup>,属于正式的官职,被纳入王朝的职官体系。明代曾设有税课局,专司税务,“局”作为正式的官署机构而存在。

[1] 朱士嘉编:《官书局书目汇编》,中华图书馆协会1933年版,引言第3页。

[2] 梅宪华:《晚清的官书局》,《出版史料》1989年第3、4期合刊。

[3] 冯峰:《“局”与晚清的近代化》,《安徽史学》2007年第2期。

与之不同，清代的“局”种类繁多、数量众多、功能广泛，但却“长期未被纳入正式职官建制”<sup>[1]</sup>。这类“局”指的是政府的某种机构或组织，比如邮政局、军需局、善后局、工程局、洋务局，是在正式官僚系统之外而设置的临时性机构，“非清代官僚体制中之常规”，多是“按照情势需要而设之临时机构”，“事情过去或情况正常化后则‘撤局’。如果变化持续，‘局’中事务可能纳入正规官僚架构之中，又或另立一永久性之机关以应付需要”。<sup>[2]</sup>晚清时期最早设立“局”，目前无确切资料记载，很可能与战后秩序重建有关，“东南各省因战乱导致衙署焚毁和人员逃亡，不能正常维持行政运作”而设置临时机构，处理相关的事务。据光绪十年（1884）户部奏折所称：“溯查设局之始，咸丰年间各省未经收复，地方不能不设局办事。”<sup>[3]</sup>因此，学者关晓红认为晚清“局”的普遍存在是“对既有行政能力不足的一种临时调整和补充”，设立目的是“因应战时危局和战后乱象”，“整顿恢复战后秩序”。<sup>[4]</sup>这一时期各省督抚设立的“书局”即是晚清众多“局”的一种，为的是解决战后文化资源短缺，重建地方文教，恢复地方文化秩序。但“书局”不仅仅是因需而临时设立，更是传统“文以载道”思路在新情势下的延续。

“书局”一词最早出现在宋代。司马光在《进〈资治通鉴〉表》中写道：“陛下俯从所欲，曲赐容养，差判西京留司御史台及提举嵩山崇福宫，前后六任，

[1] 关晓红：《晚清局所与清末政体变革》，《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5期。

[2] 梁元生：《体制内的变革：清末上海的“局”》，《晚清上海：一个城市的历史记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92页。

[3]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1879页。

[4] 关晓红：《晚清局所与清末政体变革》，《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5期。

仍听以书局自随，给之禄秩，不责职事。”<sup>[1]</sup>在此，“书局”指的是官府的编书机构。其实，官府编书有着悠久的历史。自文字产生之日起，官方就重视以“书写”维护政权合法性。当书籍成为儒家思想的主要载体时，官方更视经籍为正统之根本，认为“夫经籍也者，机神之妙旨，圣哲之能事，所以经天地，纬阴阳，正纪纲，弘道德，显仁足以利物，藏用足以独善，学之者将殖焉，不学者将落焉”。<sup>[2]</sup>因此，各个朝代都很重视经典的阐释、整理，并将之颁发至读书人中，以供阅读。

五代冯道奏请国子监刊刻九经三传，是官方刻书的嚆矢，但当时并未成立专门的机构，“编书”多为国子监的附属功能。宋代设立的书局不是官方唯一的刻书机构，除此之外，中央各监、院，地方上各路使司、州军县、公使库、州府郡县学、书院等均刊刻典籍，构成了宋代庞大的官方刊刻体系。但自宋以来，“书局”一词，作为官方编书机构的用法被沿用下来。

清代，康熙帝设立扬州诗局，成为清前期重要的官方刊刻机构。至同光年间，面对战后文化真空，地方督抚以“兴文教”为急务，倡导设立书局。一时之间，书局兴盛，有蔚然成风之势，其中较有影响的是广雅书局、金陵书局、浙江书局等。这一时期的书局已由单一的编书机构演变为编书、校书、发行的官方机构，虽然并未被纳入正式的职官体系，但已然成为清廷文化重建的必要组成部分，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官书局”一词最早出现在总理衙门议覆胡孚宸奏折中。为解决强学会被查禁的困境，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1896年2月5日），福建道监察御史胡孚宸上奏，称：“可否请旨饬下总署、礼部各衙门，悉心筹议官立书

[1] 李之亮笺注：《司马温公集编年笺注》（六），巴蜀书社2009年版，第87页。

[2] 《隋书》卷三十二《经籍志》。

局，选刻中西各种图籍，略仿照外省书局之例，详订章程，任人纵观，随时购买，并将总署所购洋报选译印行，以广流通而扩闻见。如虑事难猝举，或径招股集资在海军旧署开办。规制既宏，费用可省，经理既善，流弊自除，庶于国家作育人才、挽回时局之本心，不相刺谬。”<sup>[1]</sup>该奏折中提出将强学会改为官办书局，但并未明确使用“官书局”的字眼。在随后总理衙门议覆奏折中，肯定了胡孚宸的主张，并明确使用“官书局”一词，称：“将强学书局改为官办……建立官书局，聘订通晓中西学问之洋人为教习，常川住局，专司选译书籍、各国新报及指授各种西学，并酌派司事、译官收掌书籍，印售各国新报”。<sup>[2]</sup>光绪二十二年（1896）正月二十一日，光绪帝任命孙家鼐为管学大臣，管理官书局。二月二十一日，孙家鼐上奏其所拟订的办理官书局章程，明确了官书局的界定，欲把“官书局”办成集“藏书楼”、“刊书籍”、“备仪器”、“广教肆”为一体的综合性的官方文化机构。这与地方督抚设立的刊刻传统经典著作的“官书局”稍有不同。

值得注意的是，早期地方督抚设立的书局并未冠以“官”的字样。甲午之后，地方书局的称呼发生了变化，渐渐冠以“官”的字样，原因很可能是甲午之后清廷对书局的重视，大大提升了书局的政治和社会地位。民国时期，不少学者的著作将同光时期设立的书局称为“官书局”。这种提法得到学者广泛使用，并在叙事中被不断强化，逐渐成为学界的共识。但实际上，甲午之后清廷设立的官书局，是唯一正式以“官书局”命名的机构，名称多次出现在官方奏折和相关文书中。该官书局成立之后，主要业务包括运售各省书局的书籍、

[1]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档案号：03-7174-014。

[2]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档案号：03-5614-001。

译印西方报刊。京师大学堂设立时,该官书局成为其附属机构,最后改为商办,易名京华印书局。<sup>[1]</sup>

本课题研究的“官书局”包括 19 世纪 60 年代以来各省督抚设立的“书局”以及甲午之后清廷及地方上设立的“官书局”。

## 二、问题的提出

咸丰九年(1859),胡林翼首次在湖北设立书局,刊刻《读史兵略》、《弟子箴言》等书,开晚清地方书局之先河。此后,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马新贻、左宗棠等地方官员纷纷在各地设立书局,例如金陵书局、广雅书局、江西书局、浙江书局、正谊书局等,刊刻了卷帙浩繁的著作,刊刻量之大,种类之多,内容之丰富,居历代官方刻书之最,在晚清出版史乃至文化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19 世纪的晚清社会正经历着复杂的变迁。官书局作为晚清时期重要的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是一个多向度考察的平台,以此为研究对象或可折射出晚清社会文化的多重面相。官书局作为晚清重要的文化现象,设立行为本身就具有多重意义。书局是多种势力角斗的权力场所,寄托了各派力量的“理想”。作为清政府和地方督抚共同倡导设立的机构,书局是清政府统治政策的体现,也是地方官员“经世致用”思想的应有之义。书局作为官方设立的临时机构,是清廷试图通过“书局”重建和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的产物。具体而言,清廷试图通过官书局的刊刻活动,形成中央—地方同构的文化共同体,继而建

[1] 参见拙文《京都官书局史实考》,待刊稿。

立具有高度凝聚力的政治共同体，以此重建清廷的政治权威。对地方官而言，创办书局是官员稳定地方文教秩序，提高其在当地名望，增强在地方上影响力的重要手段。他们常常招集当地的硕学名儒参与书籍的编辑工作，以便获得地方士人的认可，逐步树立在统辖区的形象，进而获得晋升的资本。对地方精英而言，书籍的编辑“功在千秋”，增加了地方精英在社会上的名望和影响，而且获得了无形的资源，为以后的进取之路打下了基础。然而，清廷重建政治共同体的努力，虽纾解一时的困境，却难以应付层出不穷的社会危机。随着危机的加深，清廷实行政治—文化共同体的策略，渐渐偏离了原来的发展轨道。在一系列的军事失败面前，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微妙和复杂。具体来说，中央和地方更加疏离，表现在中央权力日渐削弱，各地精英的地方认同感日益增强，对政权合法性的质疑之声越来越强烈，此前设想的政治共同体变得遥不可及。尤其在甲午战败之后，各界知识精英呼吁“变法图存”，清廷转而采用“中体西用”的权宜策略，在维护“中体”本源性的同时，鼓励翻译西学，专设官书局翻译西书，编译西方报刊，并推广至各地书局。在政策调整影响下，地方和中央的关系相继发生变化，新一轮的矛盾和冲突进一步凸显，如何看待清廷政权的合法性成为争论的焦点。因此，书局成为透视中央与地方权力关系、体现知识精英与地方认同关系的重要场域。

官书局刊刻书籍多达数千种，卷数达十余万册，居历代官刻书数量之首。内容包括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之学，及西学书籍。以甲午为限，前期主要刊刻传统经典著作，后期注重译介西学著作。这种变化反映出书籍与政治情势之间的关系。“局本书”的编排方式既体现了各地知识精英的编辑意图与地方文化之间的关系，又反映了区域文化差异、市场等因素对书籍生产的影响。书籍流

通以官方背景为依托,通过调配等方式在全国范围内流通,部分书籍在书籍市场上销售。这既体现出书籍传播正统思想和理念的广度,也反映了在思想和知识传播方面的局限。从这个意义上说,官书局的书籍与政治、文化变化密切相关,通过书籍的“三棱镜”来透视晚清的社会文化变迁,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必要的。

因此,开展官书局的研究不仅是出版史意义上的课题,而且有助于进一步探究晚清时期政治与文化的互动关系。

### 三、学术史回顾

清代之时,官书局的资料整理就已付诸实践。各地书局的资料在不断地整理之中,如浙江、直隶等地书局的发行书目,<sup>[1]</sup>叶昌炽的《藏书纪事诗》<sup>[2]</sup>等。

有关地方书局的研究最早可追溯到晚清。清人叶德辉《书林清话》中曾写道:“咸丰赭寇之乱,市肆荡然无存。迨乎中兴,曾文正首先于江宁设金陵书局,于扬州设淮南书局,同时杭州、江苏、武昌继之。既刊读本十三经,四省又合刊廿四史。”<sup>[3]</sup>该文叙述了官书局设立的原因、创办情况及所刻部分书籍,其中关于二十四史的刊刻情况,认为“四省”合刻,这与后来研究者所说的“五省”合刊有所出入。孙毓修(留庵)《中国雕版源流考》主要研究雕版印刷术,简略提及了官书局的创办、出版情况。<sup>[4]</sup>净雨在《清代印刷史小纪》一文中将官书局列入印刷史的研究范畴,简明介绍官书局在当时的设立情况,并对书局之

[1] 《浙江官书局书目》,浙江官书局1892年版;《直隶官书局运售各省官刻书籍总目》,直隶省城官书局1902年版。

[2] 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光绪二十三年元和江氏江南使院本。

[3] 叶德辉:《古今刻书人地之变迁》,《书林清话》卷九,民国九年长沙叶氏观古堂本。

[4] 留庵:《中国雕版源流考》,商务印书馆1924年版,第24页。

间合作刻书及书籍的版本给予评价。<sup>[1]</sup>柳诒徵《国学书局本末》一文中对金陵书局发展沿革、校勘人员、刊刻书籍、组织管理、书籍流通等情况有详细的研究和说明，可以说是官书局个案研究的经典之作。柳氏在国学书局工作多年，对书局的演变、发展，有较深的体会和认识。这不仅是一篇研究论文，而且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sup>[2]</sup>杨寿清在《中国出版界简史》中认为官书局创设于1896年，设立的目的在于“编译西学书籍，供给学堂之用”，而未提及19世纪60至90年代之间地方督抚倡议在地方各省创立的书局，这与此前学者对官书局概念的界定不同。<sup>[3]</sup>1947年卢前在《书林别话》一文中着墨较多的是雕版印刷术的具体刻书过程，但有不少文字涉及官书局，例如官书局出书的版式、尺寸大小、刻工姓名。这是以往研究中所忽略的部分，有助于对官书局的整体认识。<sup>[4]</sup>

20世纪50至70年代，大陆学界官书局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但相关的史料相继出版。张静庐辑注的《中国现代出版史料》，收录了散见于当时报纸、杂志中的出版类文章，是研究出版史的珍贵资料。刘国钧的《中国书史简编》<sup>[5]</sup>等著作，对官书局的研究尚未展开，多是一笔带过。由于特殊政治环境的影响，许多观点带有较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对官书局的评价并不高，多数认为地方官书局是封建文化的产物，是维护清统治者利益的工具，书局的出版物多是封建的宣传品，未能对官书局给予客观的认识和评价。钱存训在《中国纸和印

[1] 净雨：《清代印刷史小纪》，张静庐辑注：《中国近代出版史料二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339—360页。

[2] 柳诒徵：《国学书局本末》，《国学图书馆第三年刊》，1930年。

[3] 杨寿清：《中国出版界简史》，永祥印书馆1946年版，第18页。

[4] 卢前：《书林别话》，张静庐辑注：《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丁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627—636页。

[5] 刘国钧：《中国书史简编》，高等教育出版社1958年版。



刷文化史》中,认为官书局的设立的原因为太平天国的毁坏,设局主要是为“补充毁于战火的书籍”,而书局刻印书籍的特点是“互通有无,刻印严谨”。<sup>[1]</sup>这是对官书局较为客观的介绍和评价。

20世纪80年代以后,伴随着史学界掀起“文化热”的浪潮,不少学者开始关注出版史的研究。在整理出版大量史料之时,学界涌现了不少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多着眼于出版通史的研究,其中不少著作提及官书局。可以说,这一时期官书局研究进入了发展较快的阶段。

### (一) 已有成果

资料整理方面,有李希泌、张椒华编《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sup>[2]</sup>,郑如斯、肖东发合编《中国书史教学参考文献》<sup>[3]</sup>,黎难秋主编《中国科学翻译史料》<sup>[4]</sup>等。上海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印刷印钞分会编的《中国印刷史料选辑》<sup>[5]</sup>,分为“雕版印刷源流”、“活字印刷源流”、“历代刻书概况”、“装订源流和补遗”四个专题。徐蜀、宋安莉编的《中国近代古籍出版发行史料丛刊》,收录了湖北官书处、陕西官书局、浙江官书局等官方书局的书目,以及晚清时期民营出版机构的书目,为出版史研究提供了第一手的资料。<sup>[6]</sup>宋原放主编的《中国出版史料》分为“古代”、“近代”、“现代”三部分,该书为十几卷本的大型出

[1] 钱存训:《中国纸和印刷文化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63页。

[2] 李希泌、张椒华编:《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中华书局1982年版。

[3] 郑如斯、肖东发编:《中国书史教学参考文献》,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

[4] 黎难秋主编:《中国科学翻译史料》,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5] 上海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印刷印钞分会编:《中国印刷史料选辑》,印刷工业出版社1990年版。

[6] 徐蜀、宋安莉编:《中国近代古籍出版发行史料丛刊》,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